

第一章 绪 论

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对国内生活和国际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仅使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问题上，而且也使得许多其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改革。

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改革主要出于两种原因。其一，中国的改革改变了全世界 $1/5$ 人口的命运和历史进程，研究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疑有助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若本着这样的精神来研究中国的改革，那就是出于学术的动机。其二，改革迅速增加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使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它们需要了解中国，需要研究作为中国的时代主旋律的改革，这是实用的研究动机。无论出于学术的还是实用的动机，要研究中国的改革，就势必要评析中国改革的动因、进程、特征、得失、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对策与前景，而这些也正是我们自己在研究改革时所必须解答的。因此，看看海外学者是怎样对待这些问题的，

不仅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改革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还有实际的意义。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意义

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海外的中国学者研究者在充分肯定这些成就的同时，还进而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本国及国际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10 多年改革最显著的也是最直接的后果莫过于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法国的帕·萨巴蒂埃说，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据他估计，改革以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10%。美国的《幸福》杂志也惊叹 改革 10 多年来，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 8.6% 左右 中国有着神话般的经济潜力。

紧随经济持续增长而来的无疑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中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迈向“小康”的生活水平。德国的赛德里茨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人比一般想象的要富裕得多。到处都可看到人民过着一种小康的生活，有时甚至超过小康。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因人而异，据世界银行估计 1988 年中国人均国民产值为 330 美元 但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萨默特和阿伦·赫斯顿的估计，1988 年中国人均国民产值高达 2472 美元，7 倍于世界银行的统计。

改革迅速增加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使中国位居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许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认为 中国是一个沉睡的经济巨人 在未来的 20 年内 中国的人均产值将翻几番，到下个世纪初，中国的绝对经济规模将超过日

本，其国民生产总值将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而且也引起了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等一系列变化。南朝鲜的全哲元曾形象地把 1978 年开始的中国的改革说成是“第二次建国”把 1949 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说成是“第一次建国”。他说 第一次建国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第二次建国则使中国的民众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中国的改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本国的范围而带有国际性，它对国际社会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许多海外学者指出，这场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关系，使中国的政治经济与世界的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赖关系迅速发展起来，使世界的注意力东移，加速了世界经济中心转向太平洋的过程。在许多海外学者看来，改革后中国迅速增大的综合国力使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改革开放政策下的中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国际上的各种力量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制衡关系。

二、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其原因多种多样，海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解释。大体说来 主要有以下这些。

解放思想，转换脑筋，挣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海外学者清楚地看到，解放思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提，无论是经济改革的总体策略还是具体措施，若从传统的意识形态看，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简直是大逆不道。例如 市场经济体制、生产责任制、承包

制、股份制、经济特区和合资企业等等，在过去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而遭禁绝。因此，思想解放，尤其是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解放，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动经济改革以及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者 D.H. 帕金斯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集中表现为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原因则是上层政治领导的观念更新，新的领导层把追求富裕当作国家的基本的目标。在他看来，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都是中国领导层观念更新的结果。

中国选择了一种适合自己国情的独特发展模式。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既没有被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束缚，大胆地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又没有完全仿效西方发达国家或其他新工业化国家的模式，而探索出了一种独特的改革模式，用中国领导人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俄国的尤里·萨文科夫曾这样说，中国没有去刻意寻找一种可以效仿的模式，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此，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采用了市场经济制度，但至今不允许西方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广大的城市。相当多的海外学者把这一点当作是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 80%，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起飞尤其重要。对中国来说，把农业改革当作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是最佳的选择。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林实认定，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政策的改变，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农村经济的成功发展。

中国没有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而选择了一条渐进的改革路线。不少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最基本的目标是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然后使人们奔向小康生活。据此，中国领

导层制定了比较实在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指标和其他社会发展指标。中国的改革者在摸索中逐渐地使改革由近及远、由易及难，最后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加坡的林任君说，1978年中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接着建立了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1984年实行更加复杂的价格改革，1985年则在城市全面推行经济改革。于是，自由的资本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开始出现了，计划经济逐渐被市场经济取代。正是通过这样的渐进策略，中国最终实现了其改革伊始制定的基本目标。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社会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些海外学者曾将中国的改革与苏联的改革加以比较，认为中国改革是先经济而后政治，而苏联的改革是先政治而后经济，并把这一点看作是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而苏联的改革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许多海外学者指出，改革 10 多年中，中国基本上保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一些学者还进而从东方社会的传统文化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认为在政治相对集权的条件下使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东亚国家的普遍规律。所谓的“东亚模式”的主要特点即在于此。

除了上面提到的因素外，海外学者论及的使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尚有：改革符合人民的利益从而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支持，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开放政策引入了大量外国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有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等等。

三、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几乎每一个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在充分肯定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许多是切中时弊和比较深刻的。

国营企业严重亏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了高速增长，但许多海外学者认为这种增长主要得益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个体经济和农村经济，而作为传统国民经济支柱的国营企业却增长缓慢。英国学者西蒙·霍尔伯顿指出，在截止 1991 年的 6 年中，国营企业的平均增长率为 7.5%，集体企业的平均增长率为 18%，而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50%。一些学者估计，截止目前，国营企业的实际亏损面已达 2/3，这些亏损的国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德国前驻华大使埃尔温·维克特说，中国政府现在要把国家总预算的 40% 和银行系统 80% 的贷款用于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

不少学者指出，造成国营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产权不明确、产品不对路、市场不健全、政企不分和管理不科学等。要搞活国营企业，就必须同时从这些方面着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提出了搞活国营企业的三种可能措施：一是解除价格管制，使产品完全市场化；二是实行产权改革；三是解除国营企业的社会职能，卸掉企业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包袱。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横田高明更加具体地提出了搞活中国国营企业的八条措施：(1)增加企业改造投资；(2)进一步削减企业的指令性生产，扩大企业经营和生产自主权；(3)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4)减轻企业负担；(5)给部分企业以对外贸易自主权；(6)进一步清理“三角债”；(7)增加对外产品开发基金的投入；(8)降

低银行贷款利率。

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存在。很多海外学者指出，改革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较高度度的通货膨胀，这是改革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1988年通货膨胀幅度竟高达 30% 形成全社会的抢购热。从 1992 年年底开始 新一轮严重通货膨胀的信号又再次出现 几十个主要城市的生活费用指数突破两位数 大大高于工业增长率。通货膨胀从表面上看是由货币过量供应引起的，但实际上它是由投资过热和消费过热引起的。香港的中国问题学者陈文鸿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其结构性矛盾 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由投资推动 而不是由消费需求拉动 投资结构偏差 信贷过度膨胀 财政赤字加大。这些结构性因素造成了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

通货膨胀意味着宏观经济调节失控，它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 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 例如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就与 1988 年开始的严重通货膨胀不无关系。因而，如何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海外学者感兴趣的焦点问题之一。多数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消除通货膨胀压力必须调整投资结构、控制消费基金、降低财政赤字。但是 由于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因而治理通货膨胀的直接手段就是改革金融体制，稳定货币政策。日本经济学家铃木淑夫和高桥亘认为，银行改革应首先把中央银行与各专业银行的帐户分开 然后把专业银行内部业务帐务分开 分清责任 要健全金融市场 在建立长期资本市场的过程中 首先应建立债券市场而不是股票市场。香港经济学家饶庆余指出，中国的货币改革应包括(1)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2)用间接手段而不是用直接的行政手段来控制货币和信贷，保持总体价格水平的稳定。(3)把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转变成自负盈亏的企业实体。(4)使人民币汇率更接近市场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斯

哥特就加强中国的货币控制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地方政府与中央银行分行的紧密联系是造成信贷失控的原因，应加强对地方分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控制。（2）政府在改革过程中不应放弃对利率的调节，中央银行必须有效地投放贷款，利率要提高，对国营企业的优惠应取消。（3）银行必须自负盈亏，应使商业银行企业化。国家收取税款，但要使中央银行对结余有更大的支配权。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够配套。一些海外学者看到，在中国，政治与经济一直难分难离，它们之间没有严格界限。随着经济改革进程的深化，下面这一点变得日益明显：影响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许多关键因素实质上都带有政治性，只有政治改革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如政企关系问题、政府职能问题、腐败问题、产权问题、企业内部民主问题等等。香港学者郑宇硕指出，认为台湾、南朝鲜等东亚新工业化地区和国家是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发展经济的观点不符合实际，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将依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腐败现象普遍，贪污之风盛行。法制不健全、价格双轨制等不合理体制的存在，政企不分等旧体制的弊端以及某些行业的垄断等等，在客观上为贪污腐败提供了物质条件，伴随 10 多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明显现象就是经济犯罪的剧增和贪污之风的盛行。虽然少数海外学者认为腐败在现代化初期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像“润滑剂”一样有利于经济的运行，但绝大多数学者仍认为，腐败正像一条毒蛇吞噬着中国的经济，它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之一。香港学者鲁凡之在谈到当代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时，着重强调了腐败的危害。他说，改革过程中虽然出现了通货膨胀等经济失衡现象，但政治腐败和意识形态崩溃所引起的深远危机，要比经济失衡严重得多、更难挽救得多，也更深刻地打上了传统中国文化运作规律的烙印。惩治腐败的根本之道在于推行政治

改革、厉行法治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环境污染严重。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并且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就。但尽管如此，环境污染仍然极其严重，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阻力。日本的竹内谦撰文列举了中国环境污染的恶况。他说，大气污染、沙漠化、水土流失、土地侵蚀、水质劣化等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冬”。美国学者奥维尔·谢尔在实地考察中国后说，我从未看到过像中国这样严重的环境污染，城市成了工厂的排水沟，河水到处漂浮着污物，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海外学者相信，环境污染是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这个代价太大了。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摆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正当关系，尤其要唤醒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鼓励建立民间的环保组织，使环境保护从单纯的政府政策转变为公民的自觉行动。

人口形势严峻。人口过多一直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顽疾。就绝对经济规模而言，中国已位居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但就人均国民产值而言，中国则一下子跌入最不发达国家之中。自从把计划生育当作一项基本国策以来，人口的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人口的过度膨胀仍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德国的埃尔温·维克特说，现在中国的人口年增长在 1500 万到 1700 万之间。除了人口绝对数量继续膨胀外，现在还出现了一些其他人口统计学方面的问题。韩国的全择元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将增至 13 亿，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人将占 10%，全国人口将严重老龄化。由于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不久一个人就将抚养 4 到 5 名直系亲属，这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由于重男轻女及农村生育不易控制等原因，整体性的人口素质有可能下降，性比例将严重失调。所有这些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海外学者指出，如何适当地调整人口政策仍是中国政府的迫切课题。

除了上述问题外，海外学者还指出了许多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 其中有 失业率居高不下、利益分配不公、知识分子待遇过低、假冒伪劣产品畅行、相当程度上存在的“铁饭碗、大锅饭”、中央财政赤字、重点项目资金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文盲率和失学率回升、与国际经济对接不够 等等。

四、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虽然不少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存在的种种艰难险阻，但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到本世纪末肯定能实现自己制定的发展目标，成为实力雄厚的经济强国。对此，世界银行、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石湾研究公司的三种预测模型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根据世界银行制定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到 2000 年 中国的农业年均增长率为 4.9% 工业为 7.1% 其他经济部门为 7.6%，国内生产总值为 6.6%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5.5% 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 9.0%。

按照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到 2000 年 中国农业的年均增长率为 3.4% 工业为 7.8% 其他为 6.6% 出口贸易总额为 2.8% 国内生产总值为 6.6%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5.5%。

世界银行和斯坦福大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主要依据中国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到 2000 年翻两番的指标，属于比较保守的低预测指标。相对而言，石湾研究公司的预测指标则要高得多。它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官方指标用不着到 2000 年，到 1995 年即能完成。它作出的预测如下：到 2000 年 中国的农业年

均增长率为 5.5% 工业为 9.9% 其他为 9.8% 出口贸易总额为 6.2% , 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8.0%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6.8% .

海外中国问题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前景所持的乐观态度典型地体现在广为流行的所谓“大中华经济圈”理论之中。按照这种理论, 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 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将是增长最迅速的地区。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在变得日益密切, 尤其是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和海峡两岸的通商, 将使它们作为一个“大中华”经济整体而形成国际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

前世界银行行长、现任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巴伯·科纳布尔和另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指出 正在崛起的“大中华”集团在经济上越来越一体化。这个“大中华”经济圈在 1989 年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加拿大和日本。美国的另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何汉理)也认为 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虽然它的完全实现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但它的巨大经济力量已经构成对美国的严重挑战, 它必须成为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

第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和目标

一般说来，在传统理论中，经典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有制与行政计划相结合的产物，而经典资本主义经济则是私有制与市场协调天然联姻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公有制与市场之间、私有制与计划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对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互结合的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在这一问题上，海外学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混合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行的，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能够协调起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存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观点。首先应该指出，即使在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海外学者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也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看法。在这派学者看来，要想使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就必须证明市场是能够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就是指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将目的与手段区分开来，而这正是传统社会主义者的薄弱之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不仅包括平等和自由，还包括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等内容，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计划就是平等的代

名词，公有制意味着消灭了剥削。这种将社会主义目的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混为一谈的观念，不仅使得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也妨碍了人们对市场制度做出正确的理解。市场社会主义者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确拥有一套界定清晰的概念，例如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地位乃至权力等方面的较大平等以及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等等，而在这一方面，以分权为特征的市场机制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们通过大量分析和论证，为市场经济提出了强有力的辩护，以使它能够承担起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重任。他们指出，市场制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最为优良的方面就是能迅速反映经济需求信号并提供必要的激励因素，从而使创新和发展成为可能；其次，它能分散经济权力，从而促进了人们的各项自由；再次，市场机制具有一种原创的正义和公平性，在其他条件相同（或不予考虑）的情况下，市场会奖赏那些辛劳工作和节俭朴素的人。当然除去各种社会和历史的因素外，市场也有某些固有的弊端，例如外部性问题，其中既有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又有各种公益的供应缺乏的正面影响问题。但这些缺陷都可以通过国家的干预得到必要的纠正。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市场社会主义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证。针对市场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观点，南斯拉夫经济学家 Б. 霍尔瓦特指出，不是市场决定社会制度的类型，而是社会经济制度决定市场的类型。例如古罗马，它的经济曾习惯于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这样一些范畴，甚至还有买卖奴隶的市场。如果给这种具有一切共同市场因素的经济选择术语的话，可以将它称之为古代市场经济，而这种经济形式是由奴隶制社会制度决定的。由此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也一样，它取决于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简单地讲，社会主义要求建立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民主，要求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社会主义所有制不是形式上的和法律上的概念，而是一种社会范畴。换句话说 现存的各种所有制 如私有制、集体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它们与公有制的概念是兼容的，只要它们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 在工人自治的组织形式上实行资本社会化 第二，在按劳分配基础上消灭剥削。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实行工人集体自治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因素，在这种经济中，市场是最为合适的调节手段，当市场失效时，即在市场不能调节的地方，就要采取计划手段。

法国经济学家 M. 拉尔文指出，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确定市场的实质和统治市场的所有制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那些存在于某些国家的既有强大的国营部门又有私有部门的“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既保护社会主义免受市场资本主义固有的不良的再分配效果的影响，又保留属于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观。拉尔文认为，必须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这类基本概念，以使我们在从命令式经济和软预算约束向市场经济和硬预算约束的过渡中，找到某一个不会超越社会主义范围的平衡点。

日本学者鹤田满彦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讨建立在更为广阔的基础之上。他批驳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的论调，认为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许多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全球范围的环境危机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均衡问题以及贫困和失业现象的大量存在。从本质上讲，缺乏全球眼光、按照利润原则运动的资本主义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而社会主义在这一方面则可以大有作为。传统上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的做法是缺乏理论根据的，社会主义固然需要计划，但其精髓在于，以生产资料社会公有为基础的社会全体成员对于生产资料的使用

具有决定权。

鹤田满彦指出，同自由和民主主义并存的社会主义必须同时是市场型的社会主义。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拥有消费者主权，企业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生产的决策权分散于社会之中，市场是人们进入生产领域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是生产信息的传播和反馈体系，实行社会分工对于生产决策权分散化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市场是绝对公平的，但又是极其冷酷和有缺陷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必须用其他制度来修正市场的不足和缺陷。目前应该考虑的是社会保障制度、遏制垄断制度、最低工资制、最高劳动时间制等 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 通过发挥自由的市场作用，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英国政治学家戴维·米勒指出 如果说在现时代 传统社会主义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那么也没有人会完全有把握地宣称，目前的资本主义形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期望。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着某种能将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效率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平等理想结合起来的第三种选择。米勒认为，要想正确地理解市场社会主义概念，就必须明确区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做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社会经济制度（它们可能是中央计划经济也可能是市场经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有这样五个方面：（1）有意识地把社会导向共同目标，避免所谓无政府状态；（2）包括议会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内的民主，后者意味着对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民主控制；（3）物质平等 即对不平等进行某些限制，同时接受根据正义原则认可的某些差距；（4）每个人有发展其潜力的积极自由，而不仅是消极自由；（5）社会具有一种合作性的一体感。在上述这些价值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张力和互不一致的地方。

米勒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设计了一种合作社式的纯粹模型，

在那里，每家企业都由所有为其工作的人进行民主式的控制，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合作社内部的收入分配。米勒认为，与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相比，市场型社会主义要求对有意识的社会指导和共同体感这两种传统目标作某种程度的弱化，而更多地诉诸民主、平等和自由三大价值目标。市场社会主义能为工业民主提供最佳机会，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平等愿望，能提供具有实质性的和相对分散的自由。

与上述观点相反，一批学者尤其是来自东欧的经济学家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们信奉自由的市场经济，认为中央计划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可改革性”，唯一的出路是走向资本主义。这些思想的代表人物当首推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耐。他的基本论点是，一旦人们拒绝接受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那么，除了各种形式的西方资本主义中的某一种外，别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有生命力的道路。匈牙利的经济尤其清楚地表明试图将公有制和市场化相结合而遭到的失败。在科尔耐看来，诸如“市场社会主义”之类的东西都纯属幻想，这样的体制是无法运行的。

科尔耐指出，从一般的角度讲，在所有制形式与协调机制之间存在两种强联系，即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国有制 + 行政协调和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的私有制 + 市场协调，它们可以被看成是标准的历史模式。而相比之下，在改革了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则一方面存在着国有制与市场协调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私有制与行政协调之间的联系（当然，私人经济主要由市场控制），这两种搭配关系可以称为弱联系。

“强”联系与“弱”联系概念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只是纯粹描述性的，其区别在于，前者是自发形成的，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没有强到足以抵制较强联系的

影响。

科尔耐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虽然吸引人，但却因存在内在的逻辑不一致而不可行。因为，没有恰当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的重要支持，就不可能产生理想的协调机制（即市场）。只有迅速扩展私人部门，才能为整个经济的市场化提供更有利的条件。而国有制的大量存在只能导致行政协调。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例如波兰经济学家 W. 布鲁斯和 K. 拉斯基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做了更为综合的论述。他们指出，尽管完全的市场机制的纯粹逻辑把非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看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自然的成份，国有企业也并不会不可避免地消踪匿迹。其可能的理由有这样三个：第一，国有企业的存在能够确保国家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岁入，它可能会多少避免非国有部门出现的逃避支付现象。第二，国有制的存在有利于宏观经济干预。第三，把企业掌握在社会手中，能使收入的差异比在私有经济中的要小，并且不会弱化刺激。此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对抽象替代方案进行选择，而是从现实的社会主义演化而来。这一演化过程是从国有企业占居优势的情况下逐步展开的，这种生活现实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唯一现实情形看来是一种混合经济，其中，不同形式的国有企业将逐渐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展开竞争。

但布鲁斯和拉斯基也强调指出，国有企业行为越符合有效市场机制的要求，它离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制就越远。而且，要使国有企业更像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就需要在国内存在非国有的环境。对于消除国有企业的自满行为和软预算约束来说，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的平等竞争是至关重要的。在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等领